

出门七步，  
遇敌十人。

# 七步镇

陈继明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 七步镇

陈继明 著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步镇/陈继明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02-014584-3

I. ①七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00910 号

责任编辑 付如初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校对 韩志慧
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72 千字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9.875 插页 2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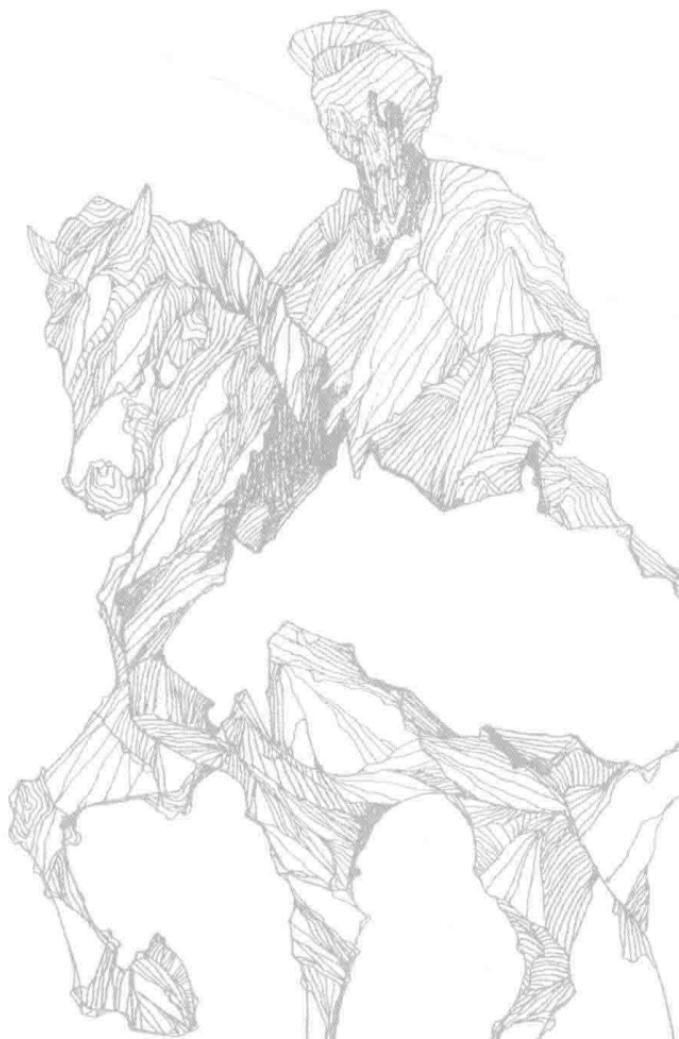
书 号 978-7-02-014584-3

定 价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出门七步，  
遇敌十人。

——七步镇谚语



出门七步，遇敌十人。

——七步镇谚语

卷  
一

1

前不久，澳门某大学的文学院拨了二十万澳元的科研经费，组织多位教师和博士集体开展“东声小说研究”，我应邀去做了一个小型演讲，并和大家一同聆听院长本人和几位师生介绍各自的研究成果。院长叫范荷生，一向关心我的小说创作，近水楼台，申请经费专门开展“东声小说研究”，自己带头写论文。

一位名叫居亦的重庆籍女博士找到我二十几岁发表的短篇小说《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》，称赞它“气质独特，起点不低，不像当时流行的先锋派那样故作姿态，也不像同样流行的新写实主义那样细碎和庸常”。我一时不敢相信被美女居亦夸赞着的那个人是曾经的我，那个二十几岁的我，又惊喜又紧张，紧张多于惊喜。

原因是，我患有回忆症。大家也许并不知道有回忆

症这么一种病。的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，死不了人，对健康也没什么明显的影响。和它相近但比它显赫的病有很多，如孤独症、抑郁症、焦虑症、失眠症、躁狂症、恐惧症、老年痴呆症、小儿多动症、更年期综合征、经济舱综合征、帕金森综合征、窥阴症、恋童症、露阴症、自恋症、异装症、恐缩症等等。回忆症的症状不难猜想，即不能不回忆，一旦开始回忆就没完没了，很难中止。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都有可能触发某一段特殊记忆。这原本很正常，人人都会如此，然而，对一个回忆症患者来说，坠入回忆却殊为危险，如同灾难，他们会深陷其中不能自拔，会反复纠缠事件的每一个细节，有时会对其中一些关键的细节做出修改，以便演绎出更好的结果，或者更坏的结果。这种行为医学上称作“修改记忆”。要么是病人自己做出的本能修改，要么是医生为了把病人抽离回忆而做出的干预式修改。

几天前我在珠海拱北一带逛街，准备去迎宾北路和九洲大道交叉口的“陇上人家”吃天水菜，刚刚拐向九洲大道的瞬间，一个骑自行车的老人突然从我身旁经过，车子后座上夹着一株两米长的向日葵秆——很快我就发现弄错了，不是向日葵秆而是半截甘蔗。但效果已然有了，我的确闻到了向日葵的味道，绝对如同真的闻到了。向日葵刚刚掰下来的一瞬间，花盘背后的海绵体猝然被撕破时散发出的那种极冲的味道。它总是又黏又湿，带着

海绵体特有的粗糙纤维不规则地喷出来，让人眼睛发酸，头皮发麻。在珠海的大街上，这个味道令我想起了童年的一个伙伴，一个名叫小迎的女孩。

小迎，我曾经吻过的一个女孩。

那是用半个向日葵换来的吻。

中午，乌鸦叫个不停，村庄昏昏欲睡，在我姑姑家的后院里，在一大堆斜立在墙上的玉米秆后面，我和小迎嘴对嘴吻了好一会儿。要不是附近的火车突然发出吓人的轰隆声，我们肯定会接着吻下去的。火车的轰隆声像一种永远挥霍不尽的东西，久久不停。我和小迎不能不相互松开，仍旧躲在霉味很重的玉米秆后面一动不动，后来我灵机一动，伸手摸了摸她的鼻子，心想这下才算对得住半个向日葵了。小迎有一个好看的鹰钩鼻子，每次看见她，我总是想不通她为什么走哪儿都带着她的鼻子？鼻子为什么总是比她更早到达某个地点？好像是她鼻子的跟屁虫，她要是偶尔把鼻子放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就好了，我就可以偷偷溜进她家摸摸它。现在我终于摸着了，我觉得这比亲嘴还有趣，亲嘴其实没太大意思。

火车的轰隆声后来开始缓缓移动，向陕西那边一路响过去，令我心生自卑。火车的巨大轰鸣说明姑姑家是一个大地方，容得下一列火车和它的轰鸣。我早就认真想过，我家的山沟沟里能和火车相提并论的东西只有防

空洞了。防空洞也许比火车还要长，里面除了阴森的黑暗就是潮湿的空气，再什么也没有，还不允许孩子们进去。我一直想，火车可能也是空的，徒有其表，发明火车和发明防空洞一样，只为了炫耀，炫耀精力旺盛，或者炫耀地方大。火车声渐渐远去之后，我和小迎突然有些不安，又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做什么，嘴亲了，鼻子摸了，实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，就躬了身一前一后走出来，各回各家了。半个向日葵在小迎的手里显得很招摇，罪证一般让我心虚，而且，她已经大咧咧揪着吃起来，还故意把瓜子皮吐在我身上，仿佛在说，呸呸呸，东声你真够坏的。我心里也承认自己够坏的，在别人家地盘上占别人的便宜，不仅亲了嘴，还摸了人家鼻子。我还想，原来亲嘴和摸鼻子并不比登天还难，甚至简单极了。正像大人们所说的，简单得像一，却被他们搞得玄玄乎乎，要死要活。没多久，我就回到那个只有防空洞的小山村——七步镇海棠村了。

第二年暑假我又去了姑姑家。这次就出了大事情。那天，车站上停着一列货车，始终不见开走。看不见头和尾的敞篷车厢，没完没了的黑乎乎的四方形，早晨在，中午在，下午还在。“死猪不怕开水烫。”小迎冲着火车说。小迎到底是大地方人，口气很大，我想，我打死也不敢把火车比喻成死猪。在火车这么一种庞然大物面前，我很难不自卑。火车发出惊天动地的尖叫时，我的自卑会像

气球一样成倍放大。况且我已经发现，火车并不是空的，每节车厢里都是满满当当。比如眼下这列货车，中间的几节车厢里是那种吓人的大型收割机，土红色，名字好像叫“康拜因”。很难想象，多大多平多辽阔的地方，才用得上这种大家伙。这足以说明，还有比姑姑家更大的地方。据说南有陕西四川，北有青海新疆，都是村里那些见过世面的老人嘴里常说的大地方。我实在有些羡慕康拜因了，因为它们显然要去那些大地方。另一些敞篷车厢里不是大大的石头就是细细的沙子。“哼哼，这些东西不怕人偷！”这也是小迎的话，是对火车停下不走的嘲讽。

下午，火车还停在老地方，鸦群不断从车厢里飞起又落下。我们七八个孩子正准备在村子里藏猫猫，突然，我冲着火车站的方向问小迎，能不能去火车上藏？小迎歪着脑袋故意掩饰着自己的激动，说，可以呀。小迎是组长，我也是组长，一个组藏，另一个组找。藏在不同的车厢里，藏在康拜因和大石头后面，藏和找都得爬上爬下，费尽周折，又麻烦又刺激，四五轮过后两个组的兴趣仍旧有增无减。该小迎那个组藏了，我们背对着火车，听见小迎快速喊了两个字，好了！我们故意不急，慢悠悠地转过身，正准备去找，看见火车突然一抖，又一抖，就像是沉默太久后车厢自动做出的生理反应，哐当，哐当，连续两下，所有的车厢一起向前，再一起向后，再向前，再向后，很松

驰，又很有力，震动传向很远的地方。等火车重新安静下来后，我们仍然不敢贸然出击，打算再等两分钟。直到躲在车厢里的几个人没耐心藏下去了，纷纷探出头，骂我们耍赖。唯独不见小迎。我抬起头冲着高大的康拜因喊，小迎，出来，不要了！小迎很反常，不吭声，也不出来。不知是谁最先发现，白光光的铁轨上有红红的东西一跳一跳，像偷偷盛开的小红花，匆匆开了又匆匆败了。紧接着大家一致发现不是别的，是血，血滴由小变大，已经变成一条线，拉在车厢和铁轨之间。我跑过去，攀住车厢自带的梯子爬上去，一露头就看见了吓人的一幕——其实，我只是闻见了可怕的血腥味，从两个康拜因之间的狭窄缝隙里喷出来。就像一个行家里手，仅仅凭着血腥味我便知道小迎死了，小迎再也回不来了。血腥味所代表的死亡甚至比死亡本身还要逼真。我在第一时间就明白小迎死了，包括她的嘴和鼻子，还有她的老气。我也迅速成长为一个老气的孩子，转身跳下车厢，拼命喊：“出事了！出事了！”

随即便是静静展开的混乱。

至今我还记得，当时我只能看见混乱的场面，听不到半点声音。不过这就够了。大人们出现后，他们的混乱和他们的镇定从两方面共同印证了我的判断：小迎死了！两个康拜因撞在一起，把小迎夹扁了！小迎，包括她的嘴巴、鼻子和老气，全都扁了。总之，那是我第一次亲

眼看见死。准确地说，是听见死。关于小迎在两个康拜因之间的样子，人们有形形色色的细致描述。但结果只有一个，小迎死了。

第二天一早我就匆匆坐车回家了。姑姑急于打发我走是因为她听到了一些议论：去火车上藏猫猫是东声的主意。姑姑问我是不是这样？我心里很害怕，但没撒谎，承认是我的主意。有很多年，我都不敢再去姑姑家，一是怕看见小迎的父母，二是怕看见火车和铁路。直到1997年，我偏偏住在了铁路旁，我的新单位——宁夏文联的家属楼就在铁路旁，火车站和仓库之间的一条铁路，只跑货车，速度极慢，没有规律，但凌晨四点左右的一趟总是雷打不动。刚刚搬进新居的那一年，每天的后半夜我都是在半睡半醒中度过的。火车车轮持续撞击铁轨的声音很优雅，很有节奏，却冷极了硬极了，让我再三地想起天地间那些明明暗暗的物理规则和强盗逻辑，比如小迎的死。小迎是被两个康拜因夹死的，这里面除了物理规则和强盗逻辑还有什么？我认为这样的死是死里面最下流的，是不可接受的。我总是想，如果这样的死可以更改就好了，所以，列车的轰隆声中，有一个关于小迎的另一种死在天地间流传。

另一种可预见的死，另一种更悲壮的死，比如，你去参加一场战争，你不幸战死，这死就是可以接受的。我认为战死是所有死里面最可接受的死。病了十年死掉，也

是可接受的。退一步讲，被火车轧死是可以接受的。而被火车上的两个康拜因夹死，算什么呢？所以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，在列车的轰鸣声中，我不知不觉创造了无数种小迎的死。小迎死了，这个事实不变，小迎如何死由我决定。当然总是和列车脱不了干系。不过在珠海的九洲大道上，这突如其来的回忆倒让我发现，我其实已经成功地遗忘了小迎。我其实是有能力遗忘的，会记住也会遗忘。既然如此，我当然还可以遗忘更多的东西。

说远了说远了，东声首先是一个回忆症患者，其次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，大家只要记得这一点就好。接下来的故事可能和写作关系不大，和回忆症瓜葛甚多。比如刚才，居亦博士对我少作《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》的谈论，便把我，把2015年的东声强行贬回到1990年，让我一下子记起了写这个短篇时的点点滴滴：草稿写在一个绿皮本子上，塑料封皮上印有“学科学”三个字。“学”字顶上的三点是奔向太空的三架飞船，微微凸起，可以触摸。抄稿用的是八开的方格稿纸，当时我不能容忍稿纸上出现任何涂抹的痕迹，只要发现错了一个字，就把整页稿纸废掉，从第一行第一个字开始重抄。还记得其中的第九页总是出错，就像着了魔，不是此处出错就是彼处出错，连续重抄了五遍。虽然很恼怒，又拿自己没办法。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。回忆中的我，像一只饥饿的蜜蜂看见了

荒原中的一片花海，钻进去，久久不肯离开。我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想回来，回到会场，回到五十岁，哪怕只是出于礼貌，却做不到。时间变成一根透明的管道，细长又弯曲，一旦不小心滑入管道的底部，就很难爬回去。透明管道里有一个略大于九十度的犄角，把我挡在时间的另一侧，就如同被“现在”无情地开除了。那个犄角也是透明的，看上去似乎毫无阻隔，却又难以顺利穿越。心里越急越是没有办法。好在这样的情形不是第一次出现，我也知道，自己近来状况良好。几秒钟后，也可能是两三分钟之后，我的意识回到了当下，看见了一张张熟悉的脸，听见居亦博士正在深情朗读《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》中的某个片段。

随后的提问环节回答了一些简单的问题，即将告一段落时，身旁的范荷生随口问我，最近在写长篇小说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不太坚定地回答，在写。范荷生很感兴趣，问，农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？我一笑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军事题材。范荷生一听，颇感失落。他显然更希望我的新长篇是关于我的文学故乡——海棠村的。范荷生一直认为我的小说还是写乡土的那一部分更好，更纯熟。他甚至建议，不要写乡土之外的东西。为了“安慰”范荷生，我说，写写停停三四年了，始终写不下去。范荷生问，你不熟悉军事题材吧？我说，其实我从小就是个军迷。范荷生大概没听懂“军迷”的意思，别人也没听懂，我

只好说更多的话,而且故意显得自信满满。我说,我是一个军事迷,我对军事的了解程度,说夸张一点,也许够做一个军事间谍了。我所掌握的军工知识,有些也许是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。一位博士生看上去很兴奋,大概也是军迷,举手要提问,范荷生看了看表,说,时间不早了,今天的活动就到这儿。鼓掌声中,下午的活动结束了。

当晚住在澳门。范荷生请我吃饭,那几位有课题的老师和学生也来了。范荷生还请来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博士,叫王龄。落座后范荷生介绍说,王龄在澳门有自己的心理诊所,主要研究超心理学,并治疗和超心理学有关的心理疼痛。王龄又是篆刻家,身兼澳门松山印社社长。范荷生小声对我说,饭后大家去王龄那儿喝茶写写字。范荷生知道我喜欢书法,事先给王龄介绍过。王龄很给面子,对我的字有好感,愿意刻一枚闲章,换我一幅字。王龄的年龄一时不好判断,像是三十出头,又像是更大一些,目光傲慢,又暗藏文雅,傲慢和文雅的混合体,却仍然是一种纯净的可亲可近的气质,令人相信此人是尖锐又善良的。我对这种气质既有隐隐的不适,又有隐隐的好感。

等菜的时候又说起了军事题材。和范荷生不同,其他人对这个话题明显更有兴趣,很想知道我在这部长篇里到底打算写些什么。

我说：“写一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冲动，但也可有可无，并不强烈。也许和我的平脚板有关，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平脚板，当不了兵，也当不了运动员，这样一来，反而更关心军事和体育方面的东西。”

说到这儿，我意识到范荷生的存在，故意用消极口吻说：“很可能扔下不写了，我写作的一大特点是半途而废，写不动就扔下，过几个月甚至几年捡起来再写，再写不动，再扔下。每一次写作都是从某一个旧底子上开始的。”

这也是实情，大家表示接受。

“什么是心理疼痛？”我问王龄，我想把话题岔开。王龄稍稍想了想，说：“比如，一个人明明被截肢了，却感到早已不存在的那部分肢体还在疼，疼痛难忍，十分真切。医学上称之为幻肢痛。幻肢痛其实是一种心理疼痛。如果一个人生来就缺胳膊少腿，则不会有幻肢痛。凡是有幻肢痛的人，都是曾经四肢健全的人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幻肢痛和记忆有关，和心理有关，是精神身体医学研究的对象。psychosomatic medicine，即精神身体医学，这种医学强调精神因素和身体疾病之间有深刻联系，外国已经很盛行，而在国内，包括港澳台，才刚起步。”范荷生问大家：“在座的谁有心理疼痛？”居亦迅速举起手，同时低下头，以做作的害羞语气说：“我。”范荷生说：“不妨说说。”居亦更显做作地说：“不好意思说。”居亦真的红了

脸，连耳根都红了，大家劝了半天她才说：“到现在我还怕打针，哪怕是体检采血，也怕，心里知道没那么疼，还是会大哭大叫。甚至怕吃药，中药怕，西药也怕。所以我从来不吃药，如果真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，我也不吃。”王龄一听就明白，说：“这种情况很常见，一般和童年记忆有关。童年时代对打针吃药的恐惧一直跟进了成年，只要一看见针头就恐惧。不是疼，是对疼的恐惧，或者说心理疼痛。”范荷生马上说：“我也学过一点心理学，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说，一个孩子打针时大哭大叫有另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为了引起父母和大人的更多关注，这样的孩子通常是自我中心主义者。”居亦漂亮的脸蛋再一次红透了，狠狠推了范荷生一把，说：“算你狠。”

饭后，我们去了王龄的心理诊所。

在那里，王龄终于说出了他早就想说的话，他说：“你那部写写停停的长篇小说，之所以写不下去，另有原因，而且是深刻原因。”

他接下来的话几乎和我心里预想的一模一样：“表面看起来，你在写一部纯虚构的长篇小说，实际上，你在追忆你本人的前世经历。”

“前世之说”我丝毫不感到意外。说实话，我自己早就相信我有前世，我的前世是民国期间的一位国民党军人。我几乎亲眼看见过我的前世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每次去七步镇赶集或者从七步镇乘车去外地，我总会头疼难